■吾心吾性

■科林碎语

两位诺奖得主在特殊时期的交锋

历史吊诡,人生奇妙。

马克斯·冯·劳厄与菲利普·勒纳德,德 国两位杰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 另外两位德国物理学大师赫尔曼·冯·亥姆 霍兹(能量守恒定律的创立者)和威廉·伦 琴(1901年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很早就有了某种交集。谁也没想到,若 干年后,身处特殊时期的他们会经历一番 剧烈的交锋,亮出各自人生的底色。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劳厄在学生时代就 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数学 教师将亥姆霍兹的一本通俗科学讲演集推 荐给他,更增进了他对当时科学主要进展 的了解。伦琴发现 X 射线不久, 他就与两 位同学合作,做了相关实验去验证。出身 于葡萄酒制造商家庭、年长劳厄17岁的勒 纳德则早已投师亥姆霍兹门下研习物理 学,而伦琴正是用他所设计的一种放电管, 于1895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因在 研究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勒纳 德被授予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获奖那年,劳厄返回母校柏林 大学,担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 (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助教, 而亥姆霍兹以前也做过普朗克的老师。 1912年,劳厄通过实验证实:X射线是一种 跟可见光一样的电磁波(而不是像阴极射

线那样由粒子组成),但其频率比可见光要 高。固体物理学中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发现开创了X射线结构分析的新领域。劳 厄由此成为 X 射线晶体学的创始人,并获 得了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就在这一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4年后的1918年11月,德 国宣布投降,"一战"以同 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受此 影响,一度成就斐然的德 国科学界出现了思想上的 分裂和混乱。曾经作出过 诸多重要科学发现的勒纳 德,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 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立场 出发,多次在公开场合批

判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并鼓吹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 同时竭力助推德国军事化。

1920年,以勒纳德为首的一些德国种 族主义科学家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反爱因斯 坦相对论的公开集会,肆意攻击爱因斯坦 及其科学理论。劳厄闻讯,第二天便与瓦 尔特·能斯特(热力学第三定律的确立者、 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等著名科学家 联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反击勒 纳德等人的疯狂行为。

1933年1月,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希特 勒成为德国总理。爱因斯坦在美国做巡回 演讲时,公开谴责纳粹的倒行逆施及反犹 主义的暴行,在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个不受 欢迎的人,被迫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劳 厄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督促科学院后

来补做了一个声明,声 称爱因斯坦是像哥白尼 和牛顿那样影响了人类 思想进程的科学家,尽 管这已于事无补。

而勒纳德在加入纳 粹组织并成为希特勒的 科学顾问后,更加肆无 忌惮地宣扬希特勒的种 族政策,排斥和迫害犹

太科学家。作为回报,纳粹党将勒纳德视 为德国物理学界的领袖和纳粹在科学界的 代言人,并授予他德意志帝国的鹰盾勋章。

劳厄嗤之以鼻,继续在大学里讲授被 纳粹明令禁止的"犹太物理学"。当纳粹的 另一位科学界代言人约翰纳斯·斯塔克 (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逼他 参加拥护纳粹的集会时,他断然予以拒 绝。在当年召开的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 劳厄以德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身份,在致开 幕词时别有意味地回顾了大约300年前,

伽利略因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 监禁的历史事实,对饱受纳粹欺辱和迫害 的犹太科学家表示深切的同情。最后他以 这样的话语作结:"然而,在任何压迫面前, 科学的捍卫者都具有完全胜利的信念,这

信念就是(伽利略的)这一句话:'无论如 何,它在运动!'。"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厄从 未涉足任何有关军事的科学活动。1939 年,他在访问瑞士时更以谴责希特勒不准 许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的公开言论,严正 表明了他的反纳粹立场。他还以实际行动 拯救过一位遭受纳粹迫害的同行,被另一 位同行称为"具有威望和勇气、敢于对抗纳 粹的罕见的德国科学家"。1943年,从未 向纳粹妥协过的劳厄被纳粹当局强令从柏 林大学提前退休。

劳厄以其对抗纳粹的硬骨头精神在国 际科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尊重。1946年,英 国皇家学会主持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他 是应邀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位德国学者。次 年,法国授予劳厄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他 捍卫人权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

再说勒纳德,德国战败时他已年过八 旬,盟军没有对他进行诉讼,只是勒令他离 开海德堡,迁居到一个小村庄。两年后,他

文·尹传红

法西斯主义最原始口号是"strength through unity"(团结就是力量),这也曾是 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口号。然而,在 19世纪的欧洲,既有康德的三大批判为资 本主义奠定基础,稍后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使当时的中间阶级转 向寻找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也反对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主张建立超阶级的集权主义统治,实际上是 落后思想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对立 意识形态夹缝中的疯狂反扑。

文艺是政治的先声,音乐也不例外。看

看希特勒最推崇的音乐家瓦格纳(1813-1883)的一生和音乐贡献吧。瓦格纳曾受巴 枯宁影响,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1849年 在德累斯顿参加五月起义,失败后被通缉, 此后12年在巴黎等地流亡。瓦格纳的青年 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受费尔 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 文章。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 后,瓦格纳逐渐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论 调以及尼采的超人论等思想,以及后来戈比 诺的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瓦格纳生活的 时代,德国人普遍认为德语不够雅致,宫廷 内外盛行意大利与法国的歌剧,偏重音乐技 巧上的华丽而忽视戏剧的内容,故瓦格纳提 倡以音乐跟戏剧并重为目的来创作歌剧。 由极端集中的情节编制出的主导动机之网 覆盖全剧,使文字语言与音乐语言完美的结 合,这恰恰与法西斯主义推崇的"个人服 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所暗合。瓦格纳 的歌剧改革主要开始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 德》,这部歌剧标志着调性体系开始瓦解,西 方世界音乐语言中一种新方言的开始—— 渗透着德意志民族特色和意识形态的艺 术。希特勒如此崇拜瓦格纳,让人专门在拜 鲁伊特为他演出瓦格纳的作品,恐怕不是对 音乐理论有多么深的见解,而是因为瓦格纳 音乐的强烈民族性和形而上学色彩。自从 浪漫主义音乐断送了欧洲古典音乐之后,西 方音乐进入了一个没有经典、只有变革的时 代,从古典时代追求音乐的共性转变为追求

再看看因《博伊伦之歌》而知名的另一 位德国音乐家卡尔·奥尔夫(1895—1982)。 《博伊伦之歌》本来是一部十三世纪的神秘 诗稿,它深藏在巴伐利亚修道院内多少世纪 不为人知,据称是目前所知保存最为完整的 也最具艺术价值的中世纪诗歌,1847年公之 于众后震惊世人,有人评价"仿佛它来自天 国,而非人间产品",却是过誉之词,在我看 来,就是一个放荡修道士私下里写的情歌。 奥尔夫于1935年将之改编为适合剧院演出 的歌唱作品,其中开场序曲"O Fortuna"(啊, 命运)可能被纳粹德国借鉴以创作装甲师军 歌。奥尔夫是与纳粹同时代的人物,不知是 时代影响了他的音乐理念,还是反过来?当 然,希特勒也很喜欢奥尔夫的音乐。奥尔夫 呼唤回归被当时作曲家抛弃的德意志民族 风格,那种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简单大小调 音乐和我听到的德国民歌特点完全一致。 要说瓦格纳的作品反映了集权思想,那么奥 尔夫的音乐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些都 和法西斯主义有深层次的联系。

同样是民族性的音乐,肖斯 (1906—1975)的第7交响曲就站在了反法 西斯的前线。1941年7月德军围攻列宁格

主

勒, 肖斯塔科维奇作为"防空监视队"的一 员战斗在第一线。就是在这种十分艰苦的 条件下,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此曲,1942年 3月5日,在古比雪夫"文化宫殿"礼堂由莫 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首演。当1942年8 月,在列宁格勒的首次公演时,乐团只剩下 15名演奏员,政府用尽一切办法帮助当地 那些还剩一口气的音乐家来到电台,但当得 知要演奏《列宁格勒交响曲》时,他们立即恢 复了生机。音乐的力量是巨大的,求生信念 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肖斯塔科维奇于1943 年创作的《第八交响曲》是一部悲剧交响乐, 作者说他"试图表现人民的体验,反映战争 的可怖"。这本是站在人类共性的立场上, 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但苏联音乐界对它相 当冷淡,多年后这部交响曲才被承认,可见 意识形态对艺术作品评价的影响之巨。

在中国,深重的苦难催生了《义勇军进 行曲》这首世界上最激动人心、催人奋发的 国歌,只有法国国歌《马赛曲》和意大利国歌 《马梅利之歌》可与之媲美,凑巧的是,中国 是亚洲文明的中心,法国和意大利是西欧文 明和南欧文明的中心。而像日本这样的岛 国,其文明的广度和积累不足以产生自洽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配产生一些自恋的 文艺作品。当年,日本投降前夕,就有擅于 音乐的人从日本兵哼唱的歌曲预知了日本 的失败。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反映的是宫 廷雅乐的审美情趣,而这种雅乐直接来自于 中国古代音乐的影响,相反,日本军国主义 却做了与这种审美完全相反的事情,可见日 本人没有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密不可分,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 团体,是从中产阶级在独占资本的权力和工 会权力之间受到折磨后感到气恼和绝望时, 不顾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开展的。要说法 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敌人,更是一切劳动 者的敌人。如今,全世界都在警惕法西斯主 义的回潮。也许我们可以从各国各地包括 音乐在内的艺术作品,提前嗅到一丝气味。

■人物纪事

胡适的"苦撑待变"

文:魏邦良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一度主张和日本 交涉,想通过和平手段和日本谋求十年的 和平。但很快,他发现日本人毫无诚意, 遂放弃了天真的和平念头。

胡适态度的变化最早见于他1935年6 月27日写给王世杰的信。

在信中,胡适认为,中国必须以付出 "绝大牺牲"的决心和日本作三年或四年 的混战、苦战:"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 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 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 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 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 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 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 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番话表明,胡适"苦撑待变"的抗日 设想已经形成。胡适是个冷静而理性的 人,他不会出于义愤主张和敌人盲目拼命 或同归于尽。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 战胜日本,但中国并非没有胜机,倘若英、 美等国能参战,中国或能赢得胜利。那么 "苦撑"为"变"赢得了时间;而"变"又赋予 了"苦撑"的意义。

1937年9月,胡适以特使身份来到美 国后,到处发表演讲,让美国人了解日本 在中国的滔天罪行。当然,胡适的最终愿 望是想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不露痕迹地 把美国引入远东的战局。

胡适赴美的第一次演讲就巧妙地表 露了这层意思。

演讲的开始,胡适表明,一切中国思想 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战争,但接着 他话锋一转,指出,仅靠爱和平,保持中立, 并不能让国家置身战争之外。他举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美国一心中立,但 最终还是被迫卷入战争。胡适强调,在拥 有无线电和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不会有孤 立的国家,所以,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任何 国家,包括美国都有可能卷入战争。

余英时认为,胡适这篇演讲,"定下了 他此后数以百计的讲词的基调"。他说: "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

然而,精于算计的美国政府可不想轻 易卷入战争。

罗斯福一度有意让中国和日本讲和。 当胡适约见他商谈第二次借款时,罗斯福 竟然向胡适表明,他可以充当中日的调停 人,建议可采用中日共管的方式来处理棘 手的"满洲国"问题。罗斯福立场突然动 摇,胡适非常着急,但仓促间又不知如何说 服总统,于是选择了"回避"。接下来的四 十天,他故意躲着总统,不给总统谈"议和" 的机会,不过,胡适暗中请朋友霍恩贝克密 切留意白宫动态,并适时打消总统"议和" 的念头。四十天后,胡适意识到躲也不是 办法,于是费劲心思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 "说帖",用最婉转的语气说明"和议"的种 种困难。在1939年10月15日的日记里,胡 适记下了起草"说帖"的良苦用心:

"我知道总统九月八日所说的话是在 那全世界最动摇的时期,他老人家也不免 手忙脚乱,所以我只用'挡'的方法,四十 天不去见总统;一面托霍恩贝克特别留意

白宫的主张。

这个密帖是用最婉转的语气,说明 '和议'的种种困难。其下篇第(6)理由, 即是解说总统所提东三省'共用共管'的 办法之不能实行。因为不便明驳总统,故 只列为和议八大难之一。"

在罗斯福立场动摇时,重庆部分高官 也曾滋生了和谈的念头,倘若胡适将罗斯 福"居中调停"的想法传至国内,这些高官 显然会借此大做文章。正是胡适当机立 断的"自作主张"将双方"议和"念头扼杀 于萌芽状态,也就阻止了他们之间可能产 生的"一拍即合"。

按美国的《中立法》,美国对交战国双 方都要实行"武器禁运"。经胡适努力,美 国认定,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不宣而 战",所以美国可以援助中国,但日本也可 以"现购自运"的方式向美国购买武器。 胡适再度与美国政府多部门频繁接触,最 终让美国接受了这样一个提案:美国总统 对违反《九国公约》的国家实施"全面禁 运",日本遂无法从美国购买武器了。

1939年,当胡适获悉白宫已把废铁、 金属,汽油、汽油产品列入禁运物品之 列后,在日记里说"大高兴"。事实上,当 时日本汽油和钢铁的储备极为有限,此举 对日本海军是致命打击。

日本不甘心在外交上失败,开始紧锣密 鼓和美国谈判。在其蛊惑下,美国国务卿赫 尔提出一个美日过渡办法:美国放宽对日本 限制,而日本自越南撤兵,解除日本对泰国、 缅甸以及中国云南的威胁。赫尔召集了中、 英、澳、荷四国大使,让他们接受这一过渡办 法。胡适当即抗议: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刚开始四个月,毫无成效,哪能就此终止;其 次,日本自越南撤军,还留下2万5千多士兵, 中国至多同意日本只能留5千士兵;更重要 的是,日本只答应不攻击云南,但可集中兵 力攻击中国其他地方。所以,这个过渡办 法,实质上就是牺牲中国。

胡适还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高层以官 方名义向美国抗议,并把"过渡办法"通报 给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随后致电美国, 认为"过渡方案"会导致中国崩溃。

在胡适的努力下,赫尔于11月26日决 定放弃过渡办法。美日谈判陷入僵局。 当罗斯福决定不和日本妥协后,他向胡适 表达了自己的预感:美日48小时内可能爆 发战争。一天后,罗斯福致电胡适,日本 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

早在1935年,胡适给王世杰写信的那 一刻就在等待的"国际的参加与援助",终 于发生了。

1940年10月12日,胡适致电政府,阐 述"苦撑待变"的含义:

"适三年来论及和战大计,总不外'苦 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 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 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 然史实所昭示,和比战难百倍,太平洋和 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也。"

日本偷袭珍珠港,让胡适"近于梦想" 的"私心所期望"得以实现。不过,其最终 实现,不是守株待兔那样"待"来的,而是 胡适通过演讲、抗议等种种手段苦苦"求" 来的。

■艺苑



1937年一二九师司令部(油画)

陈晔

■桂下漫笔

"文军长征"总司令:抗战中的竺可桢

文·胡一峰

红军长征已成近代中国一曲雄壮史 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有一支不一样的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 绝的长征。与红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由 "秀才"组成,他们的总司令是浙江大学校 长竺可桢先生。这场后来被誉为"文军长 征"的壮举历时四载,行程2600余公里。如 果说,红军长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革命乃 至现代国家建设保存了火种,那么,"文军 长征"则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来临之际,保存 了读书种子,积蓄了救亡图存的文化力量, 使民族精神延续不绝。七十余年后的今 天,翻看竺可桢在"长征路"上对学生所作 之演讲,依然能感受到坚韧不屈、绵远不绝 的伟大力量。

江西泰和城西有座萧氏宗祠,1938年6 月26日上午8点半,避难西迁的浙江大学师 生聚集于此,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竺校 长发表致辞,要点有三:一是大学生进入社 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 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二是目前学 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 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 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大之。三 是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 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份内应 做之事。竺校长要求他的学生,"离校以后, 每个人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 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把这自强不 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 市、各机关去"。

一年后,1939年7月16日上午9点,浙

大举行第十二届毕业典礼。竺可桢再次发 表演讲,重点依然是做人:"大学毕业生如 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 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 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 他认为,成功并非指名利双收,相反,读书 做事如为名为利则均有弊端,只知为社会 服务、不顾名利反可获得成功。他引王阳 明的话送给即将离开校园的同学们:"君子 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 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 其心哉。"所谓"求其是",正是一种坚定不 移地追求世间真理、恪守基本价值的节操, 竺可桢指出,此乃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精

义之所在。 这并非竺可桢第一次引用王阳明的 话。1938年11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 竺可桢 作《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阐发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良知"说。演讲 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但从竺校长的日 记中可以发现,这篇开学演讲做过精心准 备,连续几天,他研读王阳明的《南赣乡约》 《传习录》《答顾东樵书》等著作,记在日记本 上的"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等札记,恰 是竺校长演讲之主旨。

再往深远一些看,在这场"文军长征" 中,除了具体实施的总司令竺可桢,还有一 个精神上的"总司令",就是竺校长在演讲中 反复提到的王阳明。简单勾勒"文军长征" 路线图,便能看得更加清楚。1937年10月 24日, 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 决定把二三四 年级全部迁移到浙江建德去。11月11日,

浙大师生分三批出发,15日全部抵达建德。 12月24日,杭州陷落,浙大师生被迫迁到江 西吉安、泰和。由于战事的蔓延,半年之后, 泰和也放不下学子的课桌了。竺可桢决定 再次西迁,目的地是广西宜山。1940年2 月,浙大师生又进行了第四次迁徙,终于在 遵义、湄潭安定下来,坚持到抗战胜利。这 支中国读书人组成的队伍从浙江出发,经赣 南到桂北再到贵州,一路上避开大城市,专 拣偏僻县城落脚,所在多有王阳明生活之遗 迹。竺可桢亲自选定了这条路线以及每一 个落脚点,而且曾明白告诉大家,这是一场 追踪王阳明先生的"精神之旅"。抵达广西 时,他对大家说,这次进入广西,"正是蹑着 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 们不应随便放过",应该学习王明阳在艰危 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到贵州时,他又 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 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浙大 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 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 以赴。"

我以为,王阳明对竺可桢的启迪至少有 两个方面:在艰难困苦中,保持精神不堕、人 格不堕,以强大的内心、充沛的自信,坚忍前 行,把自己、别人和国家带出困境;身体力 行,从点滴做起,以文心激励人心,刷新周遭 环境,带动社会往文明的方向进步。前者是 强烈的历史担当,后者是自觉的文化使命。 这两点,正是抗战中的中国所亟需于读书人 的,也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所要求于知识 分子的。这似乎也是抗战时中国知识分子

的共识。前面提到的1938年的毕业典礼上, 国学大师马一浮应竺可桢之邀为毕业生赠 言。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 化根本则在思想。"浙大毕业生不应做"崇拜 势力,势力高于一切"的乡愿,而应抱定一种 "理想主义",做到"刚明气分,不堕柔暗", "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 实,为势力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 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 力。"王阳明的卓绝之处在于以一己之人生 融合了学问与事功,这在历代大儒中并不多 见。而在浙大的西迁路上,王阳明的精神获 得了现代的承载形式,在竺可桢带领下,浙 大师生除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还秉承 "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在赣 江边造长堤防水患,组织当地的农民垦荒, 开办识字班、学校,把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祖 国的大西南。

日寇侵华的重大图谋之一是摧毁中国 的文化。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 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 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 了保存文化血脉,许多高校长途迁徙,这是 一段悲壮但又暖人的历史,浙大的"文军长 征"只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总结长征时说了 一段很经典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 敌人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们套用一下的 话,抗战中的竺可桢率领的"文军长征",同 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我民 族精神和文化的胜利而告终的。今天,我们 纪念抗战胜利,切不可忘了这一页。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